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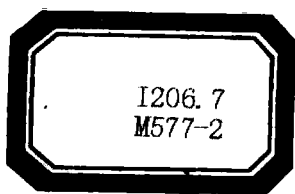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游牧的文学时代

孟繁华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游牧的文学时代

孟繁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牧的文学时代/孟繁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ISBN 978 - 7 - 5063 - 4530 - 9

I. 游… II. 孟…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331 号

游牧的文学时代

作者: 孟繁华

责任编辑: 安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30 千

印张: 16

插页: 3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30 - 9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孟繁华

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作协副主席；辽宁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兼职教授。

主要著作有：《众神狂欢》（中文、韩国文版）、《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程光炜合著）、《想象的盛宴》、《坚韧的叙事》、《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等。主编书籍6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发表论文300余篇。日本、法国、中国台湾及大陆多有评论和介绍。文章多被《新华文摘》、人大书报社中国现当代文学专辑、文艺理论专辑、文化研究专辑转载，被多种论文选本、年度论文等选编收录。获文学奖项十余种。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十三位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年1月1日



目 录

百年中国：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	1
激进的理想与世纪之梦	
——新时期文学的百年文化背景	12
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26
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44
大众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建构	58
姚文元的文体与修辞	73
内部对话中的观念同一性	
——以胡风为例	79
1978：百年中国的文学梦想	85
精神裂变与众神狂欢	99
东方风情与生活寓言	113
一个文体和一个文学时代	
——中篇小说三十年	129
战争本质的国族叙事与个人体验	
——中国、西方战争文艺“历史记忆”的差异性	147
英雄文化的现代焦虑	155
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	163
中国文学的青春	
——关于“七十”、“八十”年代作家的创作	170
“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	197

叙事姿态与文学立场	
——“新人民性文学”中的都市边缘人	202
精神信念与知识分子的宿命	
——谢冕文学思想论纲	217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化	
——洪子诚的意义与启示	228
元理论终结后的文艺批评	236
后 记	245





百年中国：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向统治集团蜂拥而至的单一流向，虽然当时“大多数的学生思想的还是科举的一套，就是说，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①但这不足为奇，即使是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还认为学界有“三魂”，^②仍有“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③之徒。然而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毕竟为知识分子从事多种职业，从投奔官僚集团的唯一选择中解放出来并以个人身份独立于社会政治提供了可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心态开始向现代转变，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④这是知识分子回归自我价值，在自身领域获得自我确证意识的觉醒。自那一时代起，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待命应召的“士”，不再是统治集团豢养的“仕”或清客，他们的心态不再是“向心”的，而是疏离的，在社会上他们有报人、教师、科学家、自由作家等多样的独立身份或职业。他们不会再为仕途失意而牢骚满腹，感伤惆怅或因怀才不遇而自命清高，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增大了他们职业的流动性，而不必矢志不移地“从一而终”，流动性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强化了自由的心态。这是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从业选择的第一次大动荡、大分化，第一次从

①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4页辑2页。

② 《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第3卷，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同上。

④ 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4页。



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这是一次“深刻的身份革命”。^①这一“革命”为知识分子的人生重建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可能，使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骤然洞开，一个“无声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有声的中国”，^②“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③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心态转变的真实写照。

世纪之初，个性解放运动已在民间自发而起，移风易俗成为新世纪到来的象征，从“放足，断发，易服发难”，^④开启了反“礼教”和等级秩序革命的序幕，结束了衣冠之治。当时《申报》曾记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民间个性解放的景观：“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束像女，女子装饰像男”^⑤“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⑥，民间的群众运动在实践层面已率先走在了前面，“贵贱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别，统统消失在追新求异的时装潮中，……服装成了一个窗口，展现了中国人性解放的千姿百态。”^⑦

但是在思想理论上对儒家传统的彻底否定还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民族危亡的欧风美雨的东渐激起了先觉知识分子民族振兴的富国强民的热望，“世界主义”的思想取向“使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可资选择的秩序，这种秩序迫使他们发现既存秩序基本制度的偶然性和缺欠。”^⑧发现了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制度的危机同时也是文化的危机。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其他问题上也许存有分歧，但在反儒家传统这一点上却达到了完全的一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

① 李书磊：《都市的迁徙》第3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②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同上。

④ 刘志琴：《衣冠之治的解体和民族意识》，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号。

⑤ 《申报》，1912年3月20日。

⑥ 《大公报》，1913年6月15日。

⑦ 同注④。

⑧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第1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胡适、吴虞等对儒家思想给予了没有退路的彻底否定。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的思想风暴中，儒家思想第一次遭到了强烈的扫荡。“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最激动人心和最具震撼力的时代口号。在五四那代人看来，儒家文化是“封建主义上层建筑”，是实现国家、民族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历史潮流的拒斥力量。批判这一传统文化不仅是救亡图存的起点，同时也是“人”的解放的起点。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呼唤争取个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是他们关怀的首要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①，“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② 不仅思想家们这样认识，作家也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③ 个性的解放成为人的解放的象征，知识分子不再唯唯诺诺谦恭谨慎，而是充满了自尊自信甚至是自以为是，对普遍关心的问题都敢于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陈独秀、李大钊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但当李大钊看到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有对国家前途悲观绝望的观点，伤感厌世的情绪时，便毫不客气地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杂志记者》^④ 一文，直呼陈独秀其名，指出其文“伤感过甚”，“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剖析批判毫不手软。鲁迅甚至在临死前还坚持“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成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反思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曾一度成为“显学”，对五四的认识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多有微词，他们指出：“反传统的‘传统’，‘鼓吹斗

①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选集》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

② 蔡元培：《〈国民〉杂志序》，载《国民》，第1卷第1期。

③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④ 见《李大钊选集》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原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



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动，反对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不仅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而且是幼稚的病态和焦躁不安。”^①“我们不能不承认以激进的方式来改造旧文化是失败的。”^②这一方式造成了“二元对立”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③。“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毋宁说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却已匆匆而去的来临。不过，对于一个真实地、历史地存在过的时代而言，这个定义不过是一种神话式的解释。如果说神话表达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独特形式所展示的未来，并通过一种具体行动预示着这个未来的实现，那么五四就是这样一种神话和预言。然而，神话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它是按照人们的期待而形成的对过去的理解，对真实的历史来说，它仅仅是人们按照意识形态的信念而作出的对于‘过去’的塑造。”^④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五四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完美的思想文化运动，后人对它反省的必要性无须赘言。但是考虑到具体的历史处境，考虑到改变传统的艰难，“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⑤因此彻底的反传统不仅是策略性的考虑，它更是现实的考虑，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⑥五四一代不仅仅破坏了旧的传统，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新文化，“五四的文化正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雏形！五四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将有一伟大腾飞的第一代‘历史见证者’！我们今日摆出一副中国文化正统传人的面孔来对‘五

① 谢选骏：《反传统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见《五四与现代中国》第31—3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李书磊：《温和的意义》，载《光明日报》，1988年6月14日。

③ 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④ 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⑤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四’评头论足，难道不觉得有点滑稽可笑吗？”^①五四运动也许有许多缺欠和局限，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它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精神风貌，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憧憬和追忆是大可理解的。

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攻击和张扬个性的个体本位思想，使五四的文化主将们无意间构成了一个挑战者的整体，挑战者崇尚“动”而反对“静”的心态使他们的叛逆性格中先在地具有了一种进攻性，这一进攻性在思想深处则可概括为一种“尚力”意识。^②这一意识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大有关系，传统柔性文化的挫折感刺伤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从而使他们转向崇尚以“力”为象征的阳刚雄性文化。作为外来的思想资源，它的开发始源于救亡图存的意义，洗涤“东亚病夫”的耻辱，但它却自然地延伸于审美的领地，使遍布中和之美的艺苑聚然升腾起充满勃勃生机的雄健之风。“力”的崇尚与尼采哲学有直接关系。在尼采看来，“生命为个体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觉，生命本质上是追求更多的力量。”^③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部分地译介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曾对尼采的学说表示兴趣，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曾指出：“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唯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并且断言：“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涛怒浪之间，恃意力以避生路者也”。^④鲁迅预告了“尚力”审美时代的到来，“诗力”、“意力”的呼唤得到了文学界积极的回应，以《女神》名世的郭沫若以狂人的姿态表现

①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6月版。

② 青年学者郭国灿的《近代尚力思潮》一文，（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对二十世纪的尚力思潮作了相当精彩的分析。

③ 见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第93页，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

④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3—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了冲决一切的向往和力度，这位“自由之神”无所顾忌地狂呼：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一个偶像破坏者哟！

而《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对“力”更是崇拜有加，一咏三叹。他早期的诗篇随处可见如“燃烧”、“爆炸”、“创造”、“飞跑”、“狂叫”等充斥着力的诗句。这种“尚力”的雄健之风使新文学洋溢着青春勃发的新风采，它的作者们也充满了昂扬的生命活力和个性特征。后来的研究者感叹地说：“五四时候的知识分子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现代风采的一代人。”^①

“尚力”改变了中国柔性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获得了审美的胜利，雄健之风成为二十世纪主流文学最易概括的特征。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作家，虽然都自由地敞开了心扉，但他们的感伤、多愁、苦闷和哀婉不仅有悖于时代潮流，同时也有悖于这一审美的时代要求而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因此，“尚力”风潮如何从审美的意义逐渐转向意识形态的意义，同样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不长的时间里，它由一个张扬显示个性的话语符号，逐渐转换为具有群体共同向往的语义系统。“尚力”逐渐为“复仇——暴力——斗争——革命”的语义系统所取代。这一切自然与五四个性解放的先驱者无关，但它转换的自然几乎到了无人察觉的地步，就不能不说“尚力”心态与后来的疾风暴雨的革命斗争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②“尚力”逐渐转向了残酷的斗争，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满了血腥味，当代文

^①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第2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② 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51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



学的经典性作品几乎都是在“血与火”中诞生的，“尚力”变成了“尚武”，“复仇——暴力”被赋予了革命的神圣意义并逐渐被读者接受而成为一种共同的审美期待，那些浅吟低唱、缠绵感伤、愁怨多情之作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而被拒斥。这一转换是令人震惊的，知识分子心态的现代转换刚刚启动就被迅速推向了另一极端，除了民族危亡的现实原因之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是否也蕴涵着极易被点燃和接受传唤的精神资源呢？文化遗传对于知识分子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五四一代对传统的彻底反叛，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和心态上就一定能够实现与传统的告别。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危机和外来文化挑战的处境中，已充分地显示了它的僵硬和自振的无望，摆脱旧路“别求新声于异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彻底反传统的五四知识分子本身就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他们恰恰是中国最具传统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余英时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传统不但没有失去它旧日的光彩，而且还焕发了新的光辉。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的“明道救世”的大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无论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其领导人物主要都是来自知识阶级。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重大的思想解放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把传统的名教纲常看做天经地义了。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思想信仰的内容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①余英时的这一判断十分准确。五四一代在反传统和倡导个人主义的时候，思想和情感本来就存有模糊和暧昧的一面。鲁迅深刻地洞察了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但他着眼的是“救救孩子”的社会启蒙；而胡适作为个人主义的思想领袖，其个人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具浓重的传统意味，他的个人主义是有条件的。他曾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

^①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载《内在超越之路》第23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版。



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但胡适的“为我主义”的最后关怀仍然是“有益于社会”。^① 胡适还是怀着一份“责任”在谈论个人主义，至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感从来就不曾放弃过。这一代人思想深处的“集体意识”使热闹一时的个人主义很快就冷却下去，在价值观上连当时最激进的人也迅速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后退五十里下寨，然后逐一投身到民族和社会运动的潮流中去。刚刚弘扬和试图建立的个体本位价值观曾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却在无声中轻易地主动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本身就说明这代人内心传统的意识是太强大了，“他们始终与传统保持着似断实续的关系，他们的激烈反传统的态度，只能使他们超越这种传统，却不能使他们脱离这种传统。”^②

这一“非制度化”的文化遗传是“个人主义”潜在的自我颠覆力量，它无法使个体本位的思想完善确立获得知识分子倾心的认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思想，“能否征服人心，它以怎样的方式去征服人心，或者又如何被人拒绝，都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环境。”^③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帝国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这种严酷现实的强烈刺激，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变得特别执拗，而只有这份责任感在心中激荡，那先前已经被理智放逐的传统意识，那注重世俗功利的群体价值的精神习惯，就很容易卷土重来。”^④ 这一现实处境甚至把最为温和平易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调动起来，他们无法成为书斋中的“看客”，不甘以局外人自居，而是自觉地投入到社会斗争中去。五卅运动刚刚发生，朱自清便写了一首《血歌》，全诗几乎全是惊叹号，加上短促的节奏和激愤的语言，大体可以想见朱自清当时无法抑制的情绪。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确实是动人的，他们感时忧国的责任感亦无可厚非。但问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版，卷5。

② 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第2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③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第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④ 同上。